

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

(一八九五—一八九八)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林能士君五十九年畢業於本校歷史研究所，本篇碩士論文由李守孔教授指導。林君目前就讀本校歷史研究所高級班。

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

(二八九五—一八九八)

The Political Reform Movement in Hunan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Histor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Series No. 38
Taipei, Taiwan University, 1972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文史叢刊之三十八：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主 編 者：

許 倬 萬

雲 里

著 作 者：

林 能 士

印 行 者：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印 刷 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一號

175元

緣起

本校文學院中國文學及歷史學兩研究所，歷屆研究生畢業論文，不乏足供學人參考之作；惟因本校經費不足，未能為之發表。承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之補助，始得慎選各論文，分冊繼續印行，定名為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自五十四年起，又得嘉新水泥公司教育基金會惠予補助印刷費，特此誌謝。

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一八九五——一八九八）

前言

道咸以降，由於外力的不斷侵入，乃使整個中國社會發生三千年來未有之劇變，國基爲之撼動。爲應付此種劇變，自強運動乃成爲當時振弱圖強的立國方案，從英法聯軍到甲午之役，前後三十多年間的中國政治，都在自強運動過程中打轉。然而此種治標而未能治本的努力，並未產生重大效果，甲午一役，清廷仍不免於喪師辱國，充分證明由官僚統治階層所苦心經營的自強運動，並非富國強兵的不二法門。

甲午戰後，清廷之腐敗盡露，而外患的侵逼，更是與日俱增。於是，全國有志之士紛紛從各種角度去探討當前面臨的危機，從不同的方向去爲國家尋找生存的途徑。他們皆能意識到西方政教制度的優長所在，深悟日本變法維新之功效。至此，朝野有識之士乃幡然改圖，在他們的呼號奔走下，孕育已久的變法運動，遂替代了自強運動而成爲清末的歷史主流。

在要求變法改革的聲浪中，湖南一隅興起了他省所無法比擬的革新氣象。甲午戰後，湖南人士以其本有的自負心與責任感，承受新思潮的刺激，乃由全國的守舊中心，一變而爲維新的積極

推動者；同時，當時也有不少維新志士不約而同地羣集於長沙，思藉湖南一隅之地，作爲全國變法革新的據點。於是，在官紳的共同倡導下，湖南省於短短二、三年間，各項新政同時並舉，蔚爲戊戌變法運動期間全國最突出最進步之一省，實在值得深加探討。

本篇之作，擬就光緒乙未戊戌年間湖南新政運動的醞釀、開展、頓挫三個過程作一敘述，藉以了解它在戊戌變法運動中的地位及其影響。第一章係從湖南的特殊歷史背景及官紳維新思想的醞釀，探究湖南新政運動發生的動力與基礎。第二章以時務學堂、南學會、報刊、政制改革四個子題爲主，分別討論，藉以了解湖南新政運動的內容。第三章則從守舊士紳、張之洞、維新人物三方面，探討湖南新政運動挫敗的原因。第四章爲結論，概括湖南新政運動在歷史上的意義及其影響。

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一八九五——一八九八）

目 錄

前言	一
第一章 湖南新政運動的發軔	一
第一節 湖南求變的思想背景	一
第二節 譚嗣同與瀏陽興算	七
第三節 江標灌輸新學新知	一五
第四節 陳寶箴與初期新政	二一
第二章 湖南新政運動的開展	三九
第一節 民權革命思想的溫床——時務學堂	三九
第二節 新政運動的領導中心——南學會	五〇
第三節 維新言論的園地——湘學報、湘報	六四
第四節 地方政制改革的椎輪——保衛局、課吏館及其他	七六

第三章	湖南新政運動的頓挫	九六
第一節	守舊士紳的攻擊	九六
第二節	張之洞的牽制	一一五
第三節	新政運動的停頓	一二一
第四章	結論	一三六
徵引及參考書目		一四〇

第一章 湖南新政運動的發軔

第一節 湖南求變的思想背景

甲午戰前，湖南素以守舊聞天下，反教排外的思想甚盛，故外國傳教士嘗喻稱湖南爲「鐵門之城」(註一)。咸同以來，湖南在整個中國的反教排外運動上，可說居於相當重要的地位。同治年間教案之層出不窮，湖南一隅所刊佈流傳的反基督教文書，實在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尤其到光緒年間，以長沙爲中心的湖南排外運動益盛，隱居全國排外運動的領導地位。當時湖南排外運動的文書大部份以揭貼爲主，此種反教揭貼與其他省份的揭貼相較，則見其以整個中國爲對象時居多，並且處處顯示湖南與中國命運的關繫，此種強烈自負心乃爲湖南排外運動的最大特色(註二)。湖南既爲徹底的排外運動地區，故外國人士在湖南的活動幾近不可能。迄同治年間，由於湖南濃厚的仇外氣氛，尙使外國人士不敢入境(註三)。

由於排外反教思想的濃厚，因此湖南人對於源自西方的新事物新觀念，亦往往表現出深閉固拒的態度。卽如同治十一年，曾國藩病歿金陵，其靈柩由新式輪船威靖號運返故鄉，舟抵長沙，湘紳起而大譁，歷數年而不息(註四)。以曾氏之豐功偉業，猶且不能免，足見當時湖南守舊排外之

一斑。輿論對湖南此種守舊排外的態度，亦屢有論及。一向鼓吹中國變法維新的萬國公報，於其一則地方性新聞中指出：「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爲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爲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見，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設立之電桿，竟敢拔而投諸之火，種種乖僻，皆自困之道也。」（註五）國聞報亦指出：「中國通商數十年，而洋人之車轍馬跡於湘省獨希，卽一切泰西利國新法，亦絲毫不能舉行。」（註六）由於湖南之拒斥西法，故甲午戰後一、二年間，湖南開明士紳議設小輪船公司時，坐鎮兩湖的張之洞猶懼湖南士民之深閉固拒，乃以「湘省民情，見異族異教如仇」、「此事行於長江下游一帶固有利無害；行於湖南，則不可如是言」爲說詞，未予批准（註七）。蓋張氏深恐湖南守舊積習未改，一旦輪船行之湖南，外國人士接踵而至，必將惹起不斷的中外糾紛。

湖南此種排外與守舊思想之形成，除與其「壤地寬僻」（註八）的地理環境及强悍的民風（註九）有關外，最要者，實爲其特殊歷史背景所致。梁啓超認爲「髮逆之役，湘軍成大功，故囂張之氣漸生，而仇視洋人之風以起」（註一〇），實爲一針見血之論。咸同以前，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亦幾不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及咸同太平軍興，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等人，當國家紛亂之際，不再以個人修省工夫爲務，而作衛道救世之號召，以湖南士民構成的集團與太平天國長期戰鬪，最後平定太平軍，一時湘軍之名，著於天下。自此而後，湖湘子弟遍

佈中國，湘軍本身固有不少人得到高官厚爵；然就整個湖南人士而言，已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感與自信心，因而形成極端熱忱的救世觀念，促進他們衛道的意識，遂形成深厚的本位主義，強烈的排外思想，亦隨之油然而生。其次，湘軍影響湖南者，厥爲紳權之大大伸張，並構成守舊的堅固壁壘。咸同軍興後，湖南首先舉辦團練，捍衛桑梓，其徵餉統率，卽常由當地的士紳擔任，乃使士紳的勢力，益趨擴大。迨湘軍解散後，湖南已成爲全國紳權最大之區（註一）。而湖南位居中國大陸腹地，其士紳能有機會與外人交結者，實在寥寥無幾，對於世界性的事物與知識，更少有研習接觸；加上湘軍立大功後，湘人所特有的囂張之氣，使得湖南人士對於外人的成見特深，疑忌亦甚，反教排外運動隨之而起，而士紳實居於領導地位。試觀湖南境內重大教案，無一不由地方士紳煽動領導，而當時流行的反教揭貼，極能激起一般民衆對基督教的仇視與憤怒者，亦都出自士紳的手筆。

甲午戰前，湖南既以守舊而著稱於世，然而甲午戰後，湖南却一改其守舊態度，幡然改圖，於短短數年之間，由全國守舊的中心，一變而爲維新的積極推動者，蔚爲戊戌變法期間最急進之省份。推源溯始，則以思想基礎爲要。

近代的湖南，在思想界人才輩出。而對近代湖南人物具有相當影響力者，首推衡陽王夫之（船山）。船山爲學肇述程朱，尤宗張栻（敬夫）。其論學純以歷史眼光爲斷，殊多精闢之處。

與其同時代的顧炎武、黃宗羲等大師，大抵皆堅貞卓絕，各有著作以貽後人，然而真能做到遜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者，要以船山首屈一指。船山歿後，由於湖南與東南文物之區不相間，船山門下復又無能爲之負荷而發揚光大者，是以其學不傳（註二）。及道光年間，湖南新化鄧顯鶴「哀輯船山遺著於散佚之餘，編校刻布，力事宏獎」（註三），遂使湖南青年士子對王船山興起嚮往與景仰。咸同年間，復經曾國藩、國荃兄弟校訂並重刻其遺著，由於曾氏兄弟名重一時，號召力大，世家大族及學署書院，莫不購備船山遺著，於是船山之學乃得大顯於世（註四），而以湖南人士感染最深。即以後來湖南新政運動的健將譚嗣同而言，其師歐陽中鵠及劉人熙，皆極端服膺船山之學，而譚氏本人的哲學思想和民族觀念，得自船山者獨多（註五）。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徐仁鑄視學湖南，亦以船山之學「纏綿忠愛之忱，凜凜乎名義之辨」，勗勉湖南士子（註六）。其他如唐才常、皮錫瑞等，或於湘報論著上，或於南學會講義中，推崇王船山思想對湖南人士啓迪之功，足見其對湖南人物之深遠影響。

王船山於明清之際以孤介拔俗之姿崛起湖湘後，百餘年間，湖南學者極少。迨嘉慶中葉後，湖南學術却異軍突起，並能獨樹一幟。此時清代國勢由盛而衰，而我國學術思想亦由「爲學問而學問」，導向於「爲經世而學問」的轉變時代。清代中葉今文學的興起，即說明此一歷史趨勢。當此交替之際，湘學的勃興，正是近代湖南地位崛起的先聲。

方清代乾嘉之世，考證之學大盛。及其末流所及，襲爲支離破碎之學，遊衍而不得所歸。而學者動樹漢學的旗幟，以非毀宋儒爲能事。此種學風流行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者最稀」（註一七），故湖南學者獨能擺脫當時乾嘉學派的錮蔽，而以時人唾棄的理學修養他們的人格，並研究當時被忽略的經世致用之學。此時湖南學者輩出，賀長齡、陶澍以名督撫而好學有著述；鄧顯鶴以搜討湖南文獻表彰先賢節義爲事；鄒漢勛、周燾昌、唐鑑等，或精研算學輿地，或爲諸史補注，或治程朱之學；魏源爲學方面極多，與龔自珍並爲常州派今文經學之饒將；「自是湘學彬彬矣」（註一八）。及道咸年間，羅澤南治程朱之學，講學於桑梓；曾國藩並治義理訓詁詞章，嘗讀書於顧亭林祠側，對於顧氏經世致用之學極爲嚮往；左宗棠、胡林翼亦同時以學問並名。故太平軍亂起，湖南學者獨能發揚蹈厲，慨然各盡其志力以當世變而終成大功。左宗棠在「箴言書院記」中云：

「自頃學術陵遲，風俗頹敝，士競科名利祿之途，靡靡然無所止極，一旦谿洞羣蠻，盜名以逞，流毒遂半天下，而湖湘諸君子獨發揚蹈厲，慨然各畢其志力，以當世變而挾其衰，忠義之風，照耀寰宇。揆厥由來，非本其先世累積之厚，敦誨之勤所貽，則亦鄉里老生流風餘韻所漸被而成者也。」（註一九）

嘉慶中葉後，湘學既大盛，遂使湖南學者咸知引國事爲己任。及大亂起，曾、羅、胡、左等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號召，用儒生爲統將，募農夫爲行伍，士人匹夫均因此毅然有守先待後捨

我其誰之壯志，湖南全省之義聲震天下，「自是一雪理學迂腐之誚，而湘學之名隨湘軍而大振」（註二〇），其影響固不僅限於一世矣。況且湘軍既定太平軍，功績彪炳，湘軍將領得到高官厚爵者自不在少數。據統計，官至總督者十四，官至巡撫者十三（註二一）。總督巡撫係一省最高長官，咸同後的地方大權皆操握在彼等之手，可見當日湘軍一系人物聲勢之大。至其影響所及，自不僅湖南人馳騁於當時政壇，亦使三湘人士以天下爲己任，形成熱忱的救世觀念，而爲後日開啓湖南新政運動的原動力。

再者，甲午戰前，湖南固以守舊聞名，然而歷數近代中國開風氣的維新人物，湖南人實居相當地位。梁啓超嘗論湖南人此種兩極端的性格：「湖南向以守舊聞天下，然中國首講西學者，爲魏源氏郭嵩燾氏曾紀澤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實維新之區也。……他省無真守舊之人，亦無真維新之人；湖南則真守舊之人固多，而真維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異於他省也。」（註二二）梁啓超推崇魏源、郭嵩燾、曾紀澤三人爲近代中國講求西學的先驅人物，要非過譽之詞。魏源爲清代中葉著名的學者，生平留心時務，講求經世。其名著海國圖志一書刊行後，風行全國，引起廣大的反應。不僅我國清末自強變法的領袖人物多受其啓示與影響，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先覺志士亦曾獲得該書的刺激與鼓勵（註二三）。所以梁啓超曾說「清季思想界，默深華路藍縷之功高也。」（註二四）「魏源著海國圖志，倡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林則徐之創譯四報，實爲變法之萌芽！」（註二五）中

國近代之言變法，實自魏源始。郭嵩燾終身倡議西法，重視外交，未曾稍變初志，晚年持節國外，留心西方政教制度的優長所在，「國人知歐洲有文化道術治法，蓋自筠仙始。」（註二六）曾紀澤於外交上卓有所成，為中外人士推重，返國後對各項新政的獻猷與籌議，皆有獨特見解，並指出中國自強有效的方針。他們三人的新知卓見，雖不見容於當時的一般人士，但其餘韻流風却盛傳於洞庭衡嶽間，歷久不磨，成為維新思想的先知。甲午戰後，湖南於數年之間蓬勃展開新政，凡關新學新論，要多標榜三氏。陳寶箴「時務學堂招考示」云：「湖南地據上游，人文極盛，海疆互市，內地之講求西學者，湘人實導其先。」「……曾惠敏崛起，遂能力爭俄廷，不辱君命，而魏默深海國圖志之書，郭侍郎使西以還之著作，皆能洞見隱微，先事而發，輒開風氣，尤為海內所推重。」（註二七）湖南時務學堂緣起一文中云：「……然竊聞吾鄉先輩，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剖剛諸先生，咸於天下不講西學之日，受怨謗，忍尤垢，毅然決然以倡此義，至今天下之講西學者，則靡不宗諸先生，烏在湘人之為守舊也。」（註二八）可知他們的苦心，至此已獲得了正確的反應。

第二節 譚嗣同與瀏陽興算

湖南由守舊而趨向維新，中日甲午之戰實在是最重要的轉捩點。以這場戰爭為界線，湖南終

由全國的守舊中心轉向爲變法維新的重要據點。

咸同軍興後，湘軍獨力勘定大局，直到光緒年間，湘軍仍肩天下之重任，其旌旗聲威遠播於天山南北。光緒二十年夏，中日戰火燎起，淮軍不敵，湖南巡撫吳大澂乃電請統率湘軍赴前敵作戰。清廷思以湘軍扭轉頹勢，卒允所請。吳大澂乃號召湘軍宿將及後裔子弟從軍，三湘人士踴躍應徵，蓋此乃湖南人士熱忱的救世觀念所使然。不幸時移勢易，吳大澂所統率湘軍，先後在牛莊、營口、田莊台等戰役，未戰先潰，甚且聞風先遁（註二九）。湘軍的潰敗，不僅證明湘軍已成強弩之末，「湘軍」時代已成過去；並且，湖南知識份子爲之驚動，頓悟虛驕囂張之氣不可恃。如譚嗣同所言：「光緒二十一年，湘軍與日本戰，大潰于牛莊，湖南人始轉側豁悟，其虛驕不可向邇之氣，亦頓餒矣。」（註三〇）三湘人士受此刺激，終於感悟時事日迫，而走向維新之途。

甲午之役既敗，在海陸交乘、畿疆危逼的形勢下，清廷唯有出於忍辱求和之一途。和議將成，時適會試之年，各省舉人集於北京者以數千計，深痛城下之盟。康有爲、梁啓超發動廣東舉人上書清廷，要求拒絕簽訂喪權辱國的和約，湖南籍舉人首先附和響應，而各省舉人繼之，於是廣東、湖南等十八省舉人一千三百餘名，聯合列名上書清廷，而康有爲擬草萬言書，請求清廷拒和、遷都、變法，此即所謂「公車上書」。公車上書雖被拒絕代轉，但旋即傳遍全國，而變法維新運動，由此開始。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康有爲等開強學會於京師，參加者皆當時一派維新分子，

康、梁更是特別活躍人物。同年九月，設分會於上海，一時南北兩學會儼然成爲維新運動的總機構。其後參與湖南新政運動者、如黃遵憲、鄒代鈞、陳三立、張通典、左孝同等皆列名其中（註三二）。

當康有爲在北京等地從事維新活動之際，湖南一隅亦已燃起改革的火炬，在開明地方官的倡導下，湖南知識份子開始一連串的變法活動。對於變法維新表現最積極的湖南士紳，莫過於譚嗣同。譚氏係一位關心現實而思想激進的青年知識份子。光緒二十一年馬關約成，他感到無比憤慨，直斥馬關條約「直合四百兆人民身家性命而亡之，此約不毀，聖人無能爲己！」（註三二）遂益發憤提倡新學，呼號變法。他上其師歐陽中鵠書云：

「平日於中外事雖稍稍究心，終不能得其要領。經此創鉅痛深，乃始屏棄一切，專精致思，當饋而忘食，既寢而累興，繞屋徬徨，未知所出。既憂性分中之民物，復念災患來於切膚。雖躁心久定，而幽懷轉結。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遠驗之故籍，近咨之深識之士。不敢專已而非人，不敢諱短而疾長，不敢徇一孔之見而封於舊說，不敢不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爲善。設身處境，機牙百出，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註三三）

在「報貝元徵書」中，譚嗣同說出馬關條約在經濟方面的巨大影響：「和約中通商各條，將兵